

秦国怎样广聚天下英才

□ 朱国峰

人才的无尽渴望。当年他的先祖秦穆公广揽天下英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这五人都不是秦人，却在秦穆公的信任下，在秦国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助秦国吞并二十余小国，称霸西戎。一时间秦国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助推当时的秦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国家之一。然而秦穆公在临终之际，竟然要求一大批贤臣殉葬，去另一个世界再次建立不世功勋。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秦国的人才大面积断档，深层次后果就是其他国家的人才再也不愿意到秦国建功立业了。秦国本就地处西陲，人才存量有限，好不容易引来了一波增量，竟然悉数“团灭”了，从此陷入恶性循环，自此秦国的国力又逐渐走向衰微。

秦孝公的“与之分土”之所以有这么强的轰动效应，是因为当时的战国诸侯还没有敢用这个条件去延揽人才的，对于人才的诱惑是相当的大。再加上他的父亲秦献公废除了人殉制度，人才去秦国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卫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在秦国推行变法，废井田破旧俗，实行军功爵制、奖励耕战，秦国面貌为之一变，国力迅速蹿升。秦孝公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将商地赐给他，故后世称之为商鞅。

自秦孝公去世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期间，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以“连横”破“合纵”。秦昭襄王重用魏国人范雎，提出“远交近攻”战略。秦始皇重用楚国人李斯、韩国人郑国等等，终使秦国扫荡六合，一统寰宇。几乎每一代秦国国君治下，都有“外国人”出将入相，尤其是来自三晋特别是魏国的人才。秦魏接壤，秦国要向东发展，首先碰到的就是魏国的阻挠，两国征战无数，可谓世仇。无奈魏国自魏文侯之后的历代国君不重视本国人才，只任用那些庸碌的所谓王公贵族，导致人才纷纷涌向秦国。此消彼长之下，魏国岂有不衰败之理？不仅仅是魏国如此，而是山东六国的常态。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哪个不是本国的王公贵族出身？这四人应是各自国家的佼佼者了，但又有谁真正让自己的国家强大了？换句话说，山东六国的政坛都已由王公贵族占据，铁板一块。那些壮志难酬的六国贤达自然要择良木而栖，而秦国就是那个时代的最佳选择，后来泛指来秦国谋就业的六国贤达为“客卿”。

当然这些所谓的“客卿”在秦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国家的利益蛋糕就那么大，“客卿”划分走了一块，本国王公贵族的蛋糕就少了，自然是要引起疯狂反扑的，或大或小的“逐客”活动一直都是存在的。但历代秦国国君始终能够明辨得失、权衡利弊，坚持相信所谓的“客卿”，最终喜获“丰收”。因为大争之世，要想统一天下，怎么能连用天下之才的胸襟都没有呢？之所以如此，秦国方能起于微末，而歼灭群雄。这种打破国别之限、地域之限、血缘之限、门户之限的用人胸怀，意义深远。



郑板桥的勤政与廉政

□ 赵天宝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板桥在潍七年，重视农桑、赈济灾民，案无留牍、事无贿赂、清正廉明，始终保持本心。

关注民生。郑板桥担任知县期间，经常到乡下“借问民苦疾”，不坐轿子，穿着布衣草鞋，打着“桥”字灯笼，微服出行，到农村，到集市，到百姓中间去，到田间地头去，访贫问俗，到处查访。由于郑板桥经常不在衙门里，上司下来，经常找不到坐衙的“醒板桥”，却找到田垄上的“睡板桥”。

案无留牍。郑板桥在潍期间时常训导属下：听差办案要诚实、勤慎。并赋诗一首：“君是天公办事人，吾曹臣下二三臣；兢兢奉若穹苍意，莫待雷霆始认真。”郑板桥时刻关注民情，夙夜在公，实现了案无留牍。

有违我任。郑板桥就任潍县知县时，恰逢潍县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灾荒。百姓饿殍遍野，民不



□ 张鑫

明清时期的皇帝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不仅民间广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流传，即便是“受命于天”“富有四海”的历代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而明清时期的传统中国已经进入了帝王教育制度和文化集大成的阶段。

经筵日讲：皇帝教育的日常形式

经筵与日讲，是明清帝王教育中最基本的两种学习形式，但经常被混为一谈。前者发轫于汉唐、奠基于宋元、完备于明清，是指朝廷在固定的地点（文华殿）固定的时间（一年分春讲、秋讲两次，每次三个月，每月逢二日，如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开讲），举行固定的仪式，专为辅导皇帝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会讲。入清以后，“经筵”则专指仲春、仲秋两次御前会讲的开讲典礼，故又称“经筵大典”。

明清两代皇帝经筵开讲，体制隆重仪式繁复程序冗长，包含祭拜、设案、展书、升座、鸣赞、行礼、进讲、赐食等诸多环节。到了乾隆年间，除了固定参加经筵的朝廷重臣之外，皇帝还会指定皇子皇孙、内外臣工列席旁听。总之“天子自正朝御鞅文华，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皆环列以听，经筵一开，天下欣欣焉，传之以为希阔之典”。

而“日讲”始于明代，顾名思义，就是日常侍讲。与强调皇家威仪的经筵不同，日讲的规模更小、仪式更简、程序更短：“侍书官侍上习书，毕，各官叩头退”，故称之为

“小经筵”“小讲”；又因是定于早上开讲，所以还有“早讲”之谓。同时，为了满足皇帝特殊的学习需求，明代还曾临时增设过“午讲”（午间讲史）和“温讲”（温习前课），虽未能形成定制，但却是帝王日常教育的重要补充。正是由于形式上的便捷高效，日讲逐渐受到了明清皇帝的青睐，取代经筵成为帝王日常教育中最主要的形式，“经筵开而后日讲继之，经筵凡十日一举，日讲无日不举”。

读经论史：皇帝教育的主要内容

经筵讲授的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要求“儒臣进讲‘四书’以《大学》为先，‘五经’以《尚书》为先”。但“四书”中最受帝王欢迎的却是《论语》和《孟子》，“五经”中除了《尚书》之外，其他经典则因内容艰深难读、远离实际，鲜为讲授。

日讲的课程内容更趋于多元，往往取材先朝祖训、历代政书、官修正史，如《皇明祖训》《贞观政要》《通鉴纲目》等。有时还要为皇帝“量身定制”教材，如张居正为少年万历皇帝选编的《帝鉴图说》。该书选历代帝王“可法者”“为戒者”百余则，因事绘图汇编成册，极便阅览。延至清代，讲授内容还增设了满语讲读；“预备立宪”时期，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讲官为光绪帝开设了“各国政略”，介绍西洋列强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末代皇帝溥仪的授课内容“分为八门，多偏重西学”，视野格局不可谓不新，但为时已晚。

要之，经筵属于专题教育，注

重仪式感和义理探究；日讲属于常规教育，注重应用性和知识传授。此外，经筵讲官可以在讲授的过程中“借题发挥”，把国情民意、国计民生、民间疾苦等基层情况通过经典阐释的方式传达出来，进而对皇帝进行规谏和引导；而日讲官不得脱离讲章任意阐述，“故事，惟经筵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正多规少”。基于此，青年皇帝多乐于日讲，因为可以轻松获取更多知识；而年长的皇帝更重视经筵，因为既可独享隆重庄严的帝王仪轨，亦可深究治国安邦的微言大义。

内外兼修：皇帝讲官的选任

随着经筵和日讲在明清帝王教育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其讲官的选授也必然受到朝野的瞩目。直接在经筵和日讲上为皇帝授课的官员，被分称为“经筵讲官”和“日讲官”。这两类讲官首先在资格资历上必须是出身科举正途的翰林儒臣，其次要“道德深纯，经学蕴藉，皆负海内重望”，同时在形象气质上还必须具备老成持重、仪表出众、身材伟岸、声音洪亮等特质。只有满足上述“内外兼修”者，才能入围朝廷辅臣们的举荐，再经由皇帝亲自审批，方能获命。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诸帝对儒家经典均有较高的造诣，经常与儒臣讲官往来互辩，进而占据了经筵日讲的主导地位。康熙帝就明确指出：“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乾隆帝更是亲制“御论”宣讲。

其实，经筵日讲不止是一种规

范帝王日常教育的制度范式，讲官们更希望以此在皇权“治统”之外，努力构建出更为宏大的学术“道统”，进而约束皇权，“增崇圣德”“致君尧舜”。在他们的理想中，经筵和日讲是尊儒重教、传达民意、规谏帝王、治国安邦的主要阵地。诚如明代名相杨士奇等言：“治国之根本在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由讲学而致治者。”清初儒臣也疾呼：“天下之治由乎君德，而君德之成本于经筵。讲幄之设，历代首重。”遗憾的是，明代后期诸帝面对内忧外患的统治危局已经无心求学，万历皇帝直接要求“免去日讲，只进讲章”。加之部分讲官“避重就轻”“照本宣科”，导致选授的课程内容单一枯燥乏味，经筵日讲因此逐渐流于形式。清军入关之后，经筵日讲的恢复促进了王朝统治基础的扩大和思想共识的凝聚，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之后日讲停罢，间有短暂恢复，经筵也大为减免。直至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经筵日讲制度亦随之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在认真总结明清时期皇帝教育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无论从宗旨立意、组织形式、课程内容，还是讲官选聘、课堂互动等方面，明清时期的皇帝教育，不仅提升了皇帝的文史素养、思辨能力和道德情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形成了有益的调控与限制；不仅有助于构建出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教体系，也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更为基层民意“上达天听”开辟了新的渠道。

历史散叶

汉初名臣张释之的劝谏之策

□ 葛斯青

的，即使是权贵也不能搞特殊。张释之在担任廷尉时也说过：“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廷尉是天下公平之所在，一旦有倾斜，天下人在使用法律时就都任意取轻或取重了。张释之正是因为坚定公正信念，恪守廷尉责任，才能真正做到秉公执法，直言敢谏。不仅能使自身力陈忠言却安然无恙，更能使作为九五之尊的汉文帝甘愿认错，堪称直言进谏的典范。

直谏既是忠臣的道德追求，也是贤士的责任担当，自古不绝。每当遇到重要原则问题时，只有敢于冒险直谏，才有可能使皇帝警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据《三国志》记载，曹植因开司马门外出并走驰道，惹怒曹操。曹操下令处死了公车令，可见阻止擅闯司马门是公车令的职责。张释之作为公车令，在太子和梁王擅闯司马门时，即便得罪了太子和梁王也敢于坚持直言上奏，用行动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也充分体现了他忠诚谋国的品质。

类比巧谏

一次，张释之陪同汉文帝打猎，到了养虎的虎圈，汉文帝向上林苑的主管上林尉询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竟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这时站在一旁的虎圈小工却对汉文帝的问题倒答如流。汉文帝便想让张释之起草诏书，任命这位能说会道的虎圈小工为上林尉。

此时，张释之在心里对汉文帝提拔小工的决定表示反对，但是他却没有直接表达反对意见，而是反问汉文帝认为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敖相如是个什么样的人？汉文帝回答说，他们都是忠厚之人，有长者风

范。张释之于是说道，“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数此畜夫谏谏利口捷给哉！”就是说绛侯和东阳侯这两位高管都是不善言辞之人，怎么会像个喋喋不休的小工一样呢！随后，张释之为汉文帝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指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形式而忽略实质。官吏们注重舞文弄墨，以吹毛求疵为高明，使得皇帝听不到一点过错，到了秦二世的时候秦朝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他更是进一步指出，“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担心提拔了这个口齿伶俐的虎圈小工，天下人也会跟风而动，争着摇唇鼓舌而不注重实际。张释之认为，上行下效比影之随形、声之回应还要快，因此他借此提醒汉文帝一定要慎重对待。汉文帝听后不仅没有不悦，更是连声称赞，并下令取消了对小工的任命。

巧谏有许多种方式，诸如善于运用比喻、类比、实例等说明问题，使对方不失体面并且容易接受。这样委婉地劝谏，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汉文帝打算提拔伶牙俐齿之人时，张释之担心这样会使天下官员纷纷效仿，而忽视实干，便以两位不善言辞的实干家为例，巧妙地避免了汉文帝作出不重实质重形式的决策。

巧思智谏

张释之在任中郎将时曾随汉文帝到霸陵参观，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眺望远方，对群臣说，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用切碎的芭麻丝絮堵住石椁的缝隙，再用漆涂在上面，后人就打不开棺槨，这样一来我的陵寝就可以永固了。

群臣闻言皆纷纷叫好，唯有张释之面露不悦。他不仅没有称赞汉

文帝，还对汉文帝说：“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郤；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意思是，如果墓里有引发人们贪欲的宝物，就是封锢南山为椁，还是有缝隙。如果墓里没有诱发人们贪欲的宝物，即使没有石椁，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丧薄薄葬，就自然不会引起后人盗墓了。汉文帝听后认为他说得很对，由此打破厚葬之风，从简办理丧事。

智谏通常在于出其不意，用众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劝谏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当众人都认为只有棺椁坚固才能抵御盗墓者，而张释之却认为棺椁之固不如无宝之安，只有“不耻贼惦记”才真正排除被盗墓的隐患。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的忠诚并不是不假思索地称赞和顺从，也不是畏惧强权而不敢讲真话。唐代鲍溶在他的诗作《倚瑟行》中对张释之赞叹道：“灞（霸）陵一代无发毁，俭风本是张廷尉。”张释之对汉文帝的智谏，打破了历史上长期以来风行的厚葬制度，也使后世对汉文帝在崇尚节俭方面有了高度评价。

《汉书》记载：“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正是因为敢于直谏、善于巧谏和智谏，张释之的不仅多次得到汉文帝赏识，封侯拜相，更在后世广受赞誉，成为忠臣名士的榜样。近代学者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写道：“（张释之）以谏争胜，故篇中载其言论独详。”张释之的直言与善谏不仅成就了一代名臣，也成就了一代明君汉文帝。

